

美国外交精英的对华错误认知剖析

钟飞腾

【内容提要】 本文对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期关于“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性国家”的相关言论进行分析，认为其误解了中国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夸大了冷战叙事对当代世界事务的可借鉴性。从更深层次因素看，伯恩斯对中国和东亚事务的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以帮助其准确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其秉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也阻碍了他对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大国特性的认识。伯恩斯等美国外交精英心灵深处的一套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昔日辉煌的余晖。

【关键词】 伯恩斯；中美关系；主导地位；自由主义

2024年2月底，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接受美国一档新闻节目采访时声称：“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性国家，美国不想生活在中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之中”。不仅如此，伯恩斯还断言，中美之间是“一场思想的竞争，一场思想的较量”。^① 伯恩斯的新闻采访发布之后，很快引起中方的关注。3月初，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即表示，“美方这一言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具建设性，中方坚决反对”。^② 伯恩斯的言论既有广泛的时代背景，也有不易为人察觉的理论和思想背景。鉴于伯恩斯驻华大使的身份，其言论对于研判中美关系走势以及美国精英的对华认知有较大价值，值得深入分析研究。

一、伯恩斯采访谈话的矛盾性和冲突性

有几项因素促使伯恩斯的这次采访受到如此关注。

第一，伯恩斯录制采访节目的地点不仅限于北京的大使馆内，还特意赴上海街头进行访谈。上海被认为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前沿，也是中美关系互利共赢的象征。伯恩斯在上海以这种方式讨论中美关系，不仅误导美国民众，也给在华的外资企业释放错误的信号。

第二，伯恩斯在谈话中表达的内容本身存在不一致性和相互矛盾。伯恩斯反复表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同时又强调不要走向冲突和战争。但是按照他在采访最后表达的意思，中美竞争的本质被概括为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冲突的概率就会大幅度上升。在人类历史上，凡是涉及理念、信念和信仰的争斗，其结果大多是零和性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中美竞争如何能够保持在合理尺度内，以及一旦没有控制好而产生何种外溢效应等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伯恩斯却未给出准确的评估。

第三，伯恩斯对冷战历史的叙事和评估

欠准确。伯恩斯认为，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进行了竞争，且美国赢得了胜利。伯恩斯将苏联的崩溃和瓦解归因于美国体制的胜利。但是，这种归因是有问题的。苏联的解体有着极为复杂的因素，不完全是美国造成的。从事实上看，美国在相互竞争中获胜，是苏联出现了问题，而非美国占据优势。从逻辑上讲，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定站在正确的历史方向上。否则的话，就不会在冷战结束后十年就发生“9·11”事件。这一事件让西方充分认识到，“历史终结论”并未终结，人类社会中有许多群体并没有接受美国宣扬的那一套价值理念。伯恩斯在描述苏联时，把它说成是一个体系或者系统（system）。在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传统中，体系的本意更多是某种深刻的洞见，但不一定代表这类洞见被所有人接受和欣赏，它的对立面是某种程度上的大而全的东西。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在诠释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知识类型时，有过一个关于狐狸和刺猬的著名比喻，前者展现包罗万象的知识丰富性，并不追求某种系统性的认识，也不奢望纳入某一内在一致的框架中，而后者则试图发展一套融会贯通的系统性认识，虽然并不一定全面，但会非常深入和深刻。按照柏林的认识，托尔斯泰属于狐狸型的知识大家。伯恩斯在采访中多次提及“system”这个词，并强调苏联这个体系失败了。将苏联当成是一个体系或者系统，背后的含义不仅是说它片面而深刻，而且还突出苏联在和美国对抗时构筑的阵营化特征。显然，更新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是拜登政府的显著特征，但中国并未针锋相对构筑一套反美同盟体系。就此而言，将美国在冷战中取胜的历史应用于当今世界，对理解今天的复杂相互依存世

界有多少可借鉴性是存疑的。

第四，伯恩斯说不想生活在中国人主导的世界中，这一点尤其冒犯了中国人的情感。外交部发言人在批驳伯恩斯的言论时表示，“中国人不会去主导世界，更不认为世界应当由谁主导”。在中文语境中，我们通常把“Dominance”翻译成“主导”。但是，在西方学界描述国际关系状况时，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有多种，“主导”只是其中的一种状态。不应忘记伯恩斯在美国已任政府职务特别是外交官员长达30余年，在表述意思时选词精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伯恩斯在来中国担任驻华大使之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任教。肯尼迪学院的教授通常具有深度参与政府事务的经历，伯恩斯的这个背景和经历使其言论可以对美国较为广泛的阶层产生影响。

二、伯恩斯对中国大国地位的错误认知

从2008年到赴华就任大使这段时期，伯恩斯在哈佛大学讲授一门名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的课程。^③多年来，中西方对大国有不太一样的认识，中方在国际上表述“大国”时将其翻译成“Major Power”或者“Big Country”。从话语体系上讲，中方对这个术语背后的理论含义和历史经验重视程度似有不够。^④无论是在19世纪兰克史学中所列举的大国，还是在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的大国，西方理论家用的是同一个词汇，但是中国知识界在将其翻译成中文时却常常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进行调整。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中文出版的一些著作中，“Great Powers”被翻译

成“列强”。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因为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造成了严重伤害，因而是被批判的对象。由于是批判的对象，人们容易忽视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和反映的重大命题。而伯恩斯在哈佛大学讲授这门课，其文献中使用的词是“Great Power”，秉持的大国逻辑延续了西方上百年对大国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的认识。从语言上讲，现实主义逻辑中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与“大国政治”(Great Power Politics)是一回事。

当伯恩斯使用“Dominance”这个术语描绘未来中国的大国地位时，更多时候其实是将其比作19世纪的状况。众所周知，在西方的语境中，19世纪是英国治下的时代，20世纪才是美国治下的时代。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在20世纪60年代时写过一部书《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其中区分了国家间权力分布的几种状态——支配(Dominance)、霸权(Hegemony)和优势地位(Primacy)，对西方理论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按照布尔的分类，“Dominance”指的是19世纪的欧洲国家对非欧洲国家(包括美国)的支配地位。20世纪美国的权力地位是“霸权”(Hegemony)，在美国阵营内部没有其他大国能与美国抗衡。在美苏竞争的一段时期，苏联在其所在的区域也具备类似的霸主地位，美苏均使用武力干涉他国，但不像19世纪那样进行殖民。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东欧地区，除非获得美苏的许可，否则其他国家不敢相互使用武力，且所属区域内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受到控制。^⑤因此，当伯恩斯使用“Dominance”而非“Hegemony”这个词的时候，他向美西方传达的信息是：21世纪中叶中国领先于其他国家

的权力状态，类似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虽未达到美苏的权力地位，但可能会对其他中小国家造成“殖民”(批评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的话语渊源之一来自于此)，因而，美西方也不应该接受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这种国家间的权力状态。

布尔在论述大国地位时还有一项被西方人广泛接受的论断，即大国一定有势力范围。中国人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将“大国”翻译成“列强”，也是反对西方列强有势力范围，对西方试图瓜分中国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但是，根据欧洲经验所形成的这样一种认识，在美西方依然根深蒂固。例如，美国当前知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也接受了布尔的这种定义，承认大国可以有势力范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冲突的原因是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东扩，消除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区，挑战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⑥作为理论家，与21世纪初发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时相比，米尔斯海默当前的观点和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美西方政治精英的两面性却在这场冲突中展露无遗。

从理论上讲，美西方学者承认大国有势力范围，北约东扩影响俄罗斯的安全。对于这一基本常识，接受过国际关系理论训练的伯恩斯并不陌生。伯恩斯出生的1956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英法围绕苏伊士运河爆发冲突，美国介入调停，在国际关系上也被认为是英国霸权完全丧失的一年。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时，伯恩斯以美国外事服务生的身份在卢森堡学习，后进入波士顿学院学习西欧历史，硕士期间在巴黎大学短期交换，并于1980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国际关系的硕士学位，

研究的领域是国际经济、美国对外政策以及非洲事务。伯恩斯的语言包括法语、阿拉伯语、希腊语等，但并不懂得亚洲的语言。其职业生涯起步于非洲地区，沿着中东地区、欧洲等展开，在苏联最终解体时刻，协助处理波罗的海国家等前苏联事务。20世纪90年代，进入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助处理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1997—2001年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深度介入巴尔干事务。中国人不会忘记1999年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伯恩斯坦还曾担任美国驻北约代表，处理过反恐联盟以及支持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冷战老兵，伯恩斯坦曾长期处于美苏（俄罗斯）博弈的前沿地带。2008年以后，才逐渐以顾问的身份帮助美国政府处理亚洲事务，并成为美国民主党的高级智囊，帮助拜登竞选美国总统，并被提名为驻华大使。伯恩斯坦的官方身份使其放弃了作为学者的逻辑，而坚持俄罗斯是俄乌冲突爆发的主要动因。

从伯恩斯坦的经历来看，尽管其对欧洲事务以及美苏（俄罗斯）关系有着极为深入的认识，但他对亚洲事务特别是对中国的了解是很有限的。这种知识储备上的不足，导致伯恩斯坦发生了严重的误判。伯恩斯坦拿到硕士学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教授国际关系的知识重镇，讲授大国课程的学校更是被誉为世界一流学府的哈佛大学，因而，他不可能不熟悉布尔的著作。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特点和反“列强”的知识传承缺乏了解。虽然我们可以接受外交官不一定像学者那样知识积累系统而深入，但是如今对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重要位置所要求的知识储备今非昔比。历史上，美国曾派日本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担任驻日大使，经济学家

加尔布雷斯担任驻印度大使，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还派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与这些人物相比，伯恩斯坦的理论水平似有不足。更深层次说，这不仅是当前美国教育体系存在重大缺失，也是美国战略界人士青黄不接的表现。

将伯恩斯坦这次采访与他近些年接受的采访进行比较，更能寻找到他讲话中隐藏的自由主义线索。比如“Dominance”这个词在伯恩斯坦的思维体系中并不是等级最高的一个词，2020年3月他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的时候曾这样表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占主导地位（predominant）。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中国还不是一个大国。欧洲在创立欧元和欧盟时向内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可能比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权力。发生变化的是中国重新成为全球大国——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与美国势均力敌”。^⑦对于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所具有的超级大国地位，世界上少有质疑。亨廷顿称其为“孤独的大国”，而中国学者曾将其形容为“高处不胜寒”。^⑧20世纪90年代，多数人在辩论美国的国际地位时认识到，其处于比西方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还突出的地位。众所周知，罗马帝国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冷战后的美国渴望超越这种地位，但迄今仍难以与罗马帝国比肩。伯恩斯坦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曾回忆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政治精英认识到美国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但是现实在于，美国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主导地位，去服务于全人类的发展，而是借势拓展并不完全受欢迎的西方式价值观，结果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败。这些年，美国学术界围绕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方案的论战，也相当深刻地揭示出理念之争的危害性。对于美国

来讲,在本国推崇理念和在别国借理念之名实施改造完全是不同的,后者已引发当地社会的剧烈反抗,极大地增加美国霸权的成本,进而削弱美国的霸权基础。基于这一现实,美国现实主义者严厉地批评美国自由主义者的霸权方案,认为其好大喜功、动摇美国国本。^⑨

冷战结束以来,像伯恩斯这样的外交和政治精英,并没能认真总结美国霸权遭致侵蚀的这段历史。作为美国民主党的拥护者,伯恩斯对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完全清楚这些价值理念究竟对其他地区和民族意味着什么?2020年3月,伯恩斯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强调,“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理念之上的国家,美国要成为照亮人类前行的光”。同时,伯恩斯又强调,“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使用灯塔这个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能追求狭隘的利益”。^⑩以此观之,自由民主这些理念不是没有前提的,在自身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时,美国的第一反应是捍卫这种利益,而不管手段的正当性和其他商业伙伴的利益。近几年到访中国的美国不同部门负责人,有的说不主张“脱钩”,有的要求中国限制出口,这些相互矛盾的表述与伯恩斯的论述具有类似性。美国外交精英说服他们自己的逻辑是,既然美国是灯塔,那么可以随时改变既定策略。

2023年12月,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并参加旧金山APEC领导人峰会后一个月,伯恩斯应邀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进行演讲。其中,用较大篇幅提到中美关系以及对美国大国地位的认识。伯恩斯表示:“中美不仅是两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肯定会如此。中美是全球影响力最广的两个国家,正在争夺全球和地区的权力”。不仅如此,伯恩斯还表示,“考虑到中美在世

界范围内更大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那么中美是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s)”。在回答听众提问时,伯恩斯表示,“我认为我们对于威胁是什么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两党共识。中国希望成为印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次进入政府之前我就这么认为,现在我坚信这是中国的长期目标”。^⑪伯恩斯用dominance描述中国的地位,用predominance描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际地位,其潜在含义是美国霸权地位是合理的、而中国获得这种地位就是野心。2020年3月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伯恩斯还提及,到2050年,“我们将看到力量平衡的巨大变化。我毫不怀疑,美国和中国仍将跻身大国行列。在过去的四五世纪里,我们已了解大西洋和地中海世界的权力发生过重大转移,那里是大部分权力的所在地。我们将看到,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四个军事强国可能是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它们都是太平洋国家。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五个最大经济体中的四个。所以,权力将集中在东亚。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印太地区是正确的,从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印度次大陆、孟加拉湾,到西太平洋、南太平洋的亚洲大经济体,这就是力量所在”。^⑫去年底伯恩斯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也提到未来30年中美是大国当中最突出的两个国家,世界权力的中心在印太。尽管他的用词是“东亚”,但伯恩斯有关东亚知识的储备似乎未能帮助其准确把握中国的发展前景。

美国人随意地制造地缘政治术语,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方式对待世界其他地区。当美国认为印太地区将成为未来世界的权力中心时,他们就确定要在这个中心位置占据有利地位,而不管是否应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要整合这样一个广阔的

区域面临巨大挑战。在冷战框架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部署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如国务院的远东司、中东司、南亚司，军队中的太平洋司令部、中东司令部等。在冷战时期，这些机构的分界线是比较清晰的，因苏联和美国阵营内的国家并无广泛的经贸联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也很清晰。但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全球南方”成为各方关注的对象，利益分割和各类事务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美国军政部门内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储备，并不一定能适应今天的世界权力格局。

前文提及，同样作为驻外大使，伯恩斯的地位恐怕无法与司徒雷登、赖肖尔等人相提并论。即便是出生在中国的司徒雷登，也没有准确判断二战结束后中国政治力量的走势，更何况对中国政治经济缺乏深入了解的伯恩斯。也有人会提出，伯恩斯在大学接受教育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还有很强的影响力，借助于费正清的著作，伯恩斯应该了解中国。费正清 1991 年辞世，如今美国学术界已少有人阅读其著作。即便是费正清，他的言论同样建立在如何更好地促成美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而不完全是承认中国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符合美国利益。由于对抗苏联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战略任务，因而只要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以此增强美国体系的力量，就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费正清很早就建议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并将中国纳入联合国体系，就是基于对抗衡苏联这一目标的坚持。

三、中美“思想之争”的核心仍是争取民心

重新审视伯恩斯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与

司徒雷登、费正清等自由主义者的一致性，即从根本上不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在伯恩斯的论述中，可以明显观察到，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没有太大差别，中共延续了苏共对抗美国的路子。显然，由于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缺乏深入认识，伯恩斯只能采取简单类比的方式来建立认知框架。伯恩斯在演讲中喜欢提及他亲民的做法，比如搭乘高铁的二等座往返京沪，与邻座的中国民众聊天，以此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的信息并不完全，特别是借此转达给美国听众，就容易偏离方向。例如，他在演讲中提及，高铁上的中国老百姓从未跟他讨论过台湾问题，多数人问的是如何将孩子送到美国接受教育。实际上，无论是司徒雷登还是费正清，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人大都属于知识精英，而不是推动中国革命成功的普通人民大众。旧中国的知识精英，甚至包括当今时代的一些知识精英，恐怕不足以了解中国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其秘诀正在于走群众路线。当前中国共产党同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不仅要服务于 14 亿多中国人，并且要团结世界上的多数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让普通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目标如果实现，那么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基础就很牢固。而一个统一和稳定的中国，实际上一直让西方有所担忧，因为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能演变成一个统一体。从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过肢解中国的妄想，都是这种思潮的反复涌现。一定程度而

言，伯恩斯也受到上述论述的影响，他倾向于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其前提是维持稳定团结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他反复提到，要用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的制度体系，打散和拆解中国的团结。伯恩斯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提及，改革开放以后，累计已经有 1200 万中国人曾到美国学习、做生意，他还得意地宣扬，这些人羡慕美国式民主，了解美国的政治运作。伯恩斯认为，这些人对维护中美之间的和平至关重要。他也强烈建议，要进一步扩大美国学生在中国的留学规模，加强两方的人文交流。需要注意的是，伯恩斯在此处理了一个“雷”。他在提出这样的构想时有一项关键的区分，将中国政府视作美国政府的竞争对手，而乐于赞扬中国人民。这种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搞对立的做法并非始于拜登政府时期，特朗普时期就已有之。其实，将美国政府与人民分开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观点，但此观点是基于美国的政治现实而得出，伯恩斯这么做不仅是东施效颦，也进一步显示出其对中国政治缺乏了解。

2023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对美国友好团体发表重要演讲时曾提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⑬几乎是同一个时刻，中美领导人均认为，两国的人民彼此都会要求搞好关系，而对方政府中的某种力量是导致中美对抗的根本原因，因而中美领导人均将希望寄托在对方的人民，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基层，这个共识是让人惊奇的。相比于美国的这种转变，中国的这一认识要持久得多，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就反复强调，美国人民求解放，会尊重中国。现在不好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也这么重视中国的民众了！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明确提出“中产阶级外交”，要求发展壮大美国中产。^⑭拜登之所以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是因为美国中产阶级萎缩造成美国人不再那么支持全球化，美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出现了严重的排外和孤立的做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近些年来，在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否定全球化、否定国际合作的做法。一言以蔽之，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上升与美西方的统治阶层长期忽视中下阶层有关。

伯恩斯接受访谈的最后部分内容，将中美竞争界定为思想和观念的竞争。当伯恩斯说美国寄希望于跟中国人民搞好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承认支撑资本主义体系运转的机制——常态化的竞争，一定会造成损失者或者说失败者，美国现在要真正重视因竞争所致的失败者。并且，伯恩斯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如果中国采取美式民主，中国人民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但这种假设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不成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式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是股东至上，失败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失败者不能埋怨政府，只能从自身找原因。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隐隐然有替代股东资本主义的趋势。^⑮如果资本主义仍然围绕股东来转，那么就意味着不掌握资本的美国民众仍然是没有发言权的。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与拜登政府所宣传的尊重美国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冲突。除非美国改变以股东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思想，将失败者纳入体系当中，否则伯恩斯坚信美国必胜就是一叶障目。

在美国的价值体系中，西式自由民主被认

为具有普世性。中国提出了新的价值体系，即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美西方的普世价值相比，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和平发展列于第一序列，公平正义列入第二序列，而自由民主只是在第三序列位置上。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摆在眼前的迫切需求是维护和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对这两个基本目标和诉求视而不见，转而谈一些需求不那么紧迫的问题，反映出美西方价值体系的虚幻性。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发展，民主只会成为阻拦公共事务的借口。在全球性公共问题暴增的当今时代，美国不将解决全球性挑战作为首要任务，反而围堵和遏制中国，这种做法难以让中国接受。作为世界知名大学最多、智库最发达的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应将应对全人类的挑战放在首位。但应对全球性挑战却并非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美国共和党 and 民主党围绕要不要继续坚持推进碳减排，多次发生激烈的争论。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宣扬，气候变化是个假问题。与之相比，中国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西方崛起以来，西方人展现的优势是征服其他民族，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这些历史进程曾起到推动人类进步的一面，但也无人否认这一进程对很多民族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因而其价值体系的普世性并不存在。

西方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即技术进步和劳动力需求减弱之间的矛盾。机器替代劳动力的现象并不新鲜，马克思对此早有深刻的论述。如今，美国将人工智能视作中美竞争的主要内容，因而多方面限制中国从西方获取技术。不仅如此，以往美国政府同意技术转移的前提是保持技术代差，现在则改为无限制地扩大美国与中国的技术差距。西方发明了很

多技术，用于征服其他民族和自然，但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本身也对美国的工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个悖论其实不好解决。

伯恩斯在采访中还有一个观点需注意，即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伯恩斯反复宣扬，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美苏对抗中起了作用。但更准确的事实是，美国政治精英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大西洋两岸的事，与其他地区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不那么国际。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扩展到全球，但即便如此，其他国家也不是无差别地接受这种安排。被西方号称是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也没有完全接受美国的规则。因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本质是接受美国领导，便于美国自己在规则看起来不方便时无视、逃避或改写规则，因而这种“规则”是相当特殊的一类规则，与法律专家通常使用的“规则”含义非常不同。

与美国强加规则不同，现代中国的秩序观，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其基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社会如要维持和平，必然要充分重视公平和公正问题。中国从来没有说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者让其他国家照搬照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侧重于提供一种参考，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有选择地吸收。中国也不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因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更乐于与中国合作谋求发展。与英国霸权下的19世纪不同，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已有很大的跃升，无论是用电量、教育水平，还是基础设施等，发展中国家已今非昔比，生活在发展中世界的人民，对当今世界的状态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而也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背后的支撑因素是人民的觉醒，他们对西方国家所描绘的历史

和展示的前景并不那么信任和接受。

“全球南方”思潮的再度勃兴也表明，发展中国的觉醒就是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西方在崛起过程中凭借力量优势，非常傲慢地将其他民族归之于没有文字的历史，需要从特殊的人类学等学科加以解释，并且曾一度坚持文明社会可以用武力改造半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对那些愿接受美式规则的国家则扮演颐指气使的“教师爷”。中国作为复兴的文明大国，在其低潮时曾饱尝人情冷暖，不仅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感同身受，而且拥有非常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观。这种衰落又崛起的历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中国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希望与其他国家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伯恩斯所坚信不移的西式民主体制，其核心是解决个体利益加总的难题。相对于封建时代，资本主义体制所坚持的“一人一票”有进步性，即肯定个人的权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夕之间完成的，而是历经数百年。与它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相比，目前西方社会的选举，更多时候是51%得票率对49%得票率的赢者通吃模式，这对失败者而言缺乏应有的公平正义。在21世纪，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觉醒，利益加总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例如，东盟首先提出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已被东亚地区内国家普遍接受。中国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协商一致的“亚洲方式”，认为东方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智慧，也日渐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认可。^⑥从亚洲的经验出发，争取人口规模巨大社会的民心，必须要立足于传统和本土。在人口规模巨

大的社会，其实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在和平的基础上推动发展。也只有在此共识上形成的政策和举措，才能真正落地并维持可持续性。

结语

伯恩斯是目前美国外交精英的代表性人物，因而其有关中国发展前景的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期美国这一群体的认识。毫无疑问，他的言论不仅难以说服中国人，也表明美国权力精英的傲慢，在对东亚和中国认识不深入和不系统的状况下，反复通过大众媒体向美国民众传达错误的认识。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伯恩斯不仅不承认美国现实主义者对大国特性的结论，也没能跟上时代步伐放弃“华盛顿共识”，仍沉迷于自由民主那套价值理念，由此将中美竞争界定为思想之争。

伯恩斯的经验世界中缺少美国衰落的精神印记，尽管其在学生时代熟悉西欧的历史，但却很少提及美国应当汲取英国霸权衰落的历史教训，强调较多的反而是美国需要扮演灯塔的使命感。与之相比，中国人并不缺乏历史的荣耀感和使命感，且自近代以来涤荡心间的更多是忧患意识，中国既能够理解美国人的那种舍我其谁的心态，也能够理解比我们更弱更穷更小的国家的心态，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应当得到大国必要的尊重。如果伯恩斯真的重视民心，那么应当将尊重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列入必修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与周边安全新态势研究”（项目编号：23&ZD331）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 Lesley Stahl, etc., "U.S. Ambassador on Why China Competition Must be Managed While Keeping 'the Peace'," February 25, 2024, CBS News, <https://www.cbsnews.com/news/china-us-relationship-nicholas-burns-60-minutes/>, 访问时间: 2024年3月18日。
- ② 《伯恩斯称“中国最终目标是超越美国、主导全球”, 外交部驳斥》, 澎湃新闻, 2024年3月4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46850, 访问时间: 2024年3月19日。
- ③ 可参考该学院对伯恩斯的简介, <https://apps.hks.harvard.edu/faculty/cv/NicholasBurns.pdf>。
- ④ 钟飞腾:《超越地位之争: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 载《外交评论》, 2015年第6期, 第69—94页。
- ⑤ [英]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 张小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 第179—183页。
- ⑥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77–8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kraine War,"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21, Summer 2022, pp.12–27.
- ⑦ "Nicholas Burns: Why Does Good Diplomacy Matter?" Mar.23, 2020, *Harvard Magazine*,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nicholas-burns-why-does-good-diplomacy-matter>, 访问时间: 2024年4月16日。
- ⑧ 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 ⑨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李泽译、刘丰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
- ⑩ "Nicholas Burns: Why Does Good Diplomacy Matter?" Mar.23, 2020, *Harvard Magazine*,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nicholas-burns-why-does-good-diplomacy-matter>, 访问时间: 2024年4月16日。
- ⑪ "Ambassador Burns' Remarks And Q&A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cember 20, 2023,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ambassador-burns-remarks-at-qa-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访问时间: 2024年4月16日。
- ⑫ "Nicholas Burns: Why Does Good Diplomacy Matter?" Mar.23, 2020, *Harvard Magazine*,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nicholas-burns-why-does-good-diplomacy-matter>, 访问时间: 2024年4月16日。
- ⑬ 习近平:《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载《人民日报》, 2023年11月17日, 第02版。
- ⑭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20, pp. 64–76.
- ⑮ [德] 克劳斯·施瓦布、[比] 彼得·万哈姆:《利益相关者》, 思齐、李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年。
- ⑯ 《专访: 东方智慧对解决世界纷争具有深远意义——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新华网, 2023年12月31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1231/c1002-40150102.html>, 访问时间: 2024年4月22日。

(截稿: 2024年5月 责编: 季哲忱)

作者简介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